

教师
月刊

2016.6

王雪娟：
发现自己的使命

成长的标准并不只是成绩、赛课、课题、论文这些显性成果，还有隐藏在这些背后的一种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那就是专业反思力。

——王雪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雪娟：发现自己的使命

11月3日
11月16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雪娟:发现自己的使命/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75-4992-0

I. ①王… II. ①教… III. ①教育理论-文集 IV. ①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3038号

王雪娟:发现自己的使命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风保
设计 张 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6年6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4992-0/G·9305
定价 16.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 006 汉末学子的光辉岁月 _ 周勇
- 010 教师应当成为知识分子吗 _ 吴康宁
- 012 “名校”的课堂为什么动不了 _ 郑杰
- 015 春风浩荡 _ 吴慧琴

封面 >

- 018 王雪娟：发现自己的使命

人物 >

- 050 **名家** 倪蕊琴 我的托尔斯泰情结 _ 汤涛 俞玮琦
- 微博** 程俊英 / 卡尔·爱德华·萨根

现场 >

- 075 **记事** **曹丽秋专辑**
- 一脉脉书香
- 快乐
- 081 **摄影手记** 窗外有一首唐诗（外二篇） _ 高东生
- 088 **课堂** 课堂杂记 _ 王文丽
- 095 **吴非说** 虎妈狼爸们的起跑线
- 097 **朱永新答** 教师要做“领读者”

话题 >

099 教师为什么生气（下）

在意本应在意的 _ 赵坡

老师会被气死？才不呢！ _ 武新明 王雷

怎样才能不生气 _ 王方全

做个不生气的教师 _ 汪燕

阅读 >

111 阅读与文化 _ 金丝燕

人文 >

121 中国教师诗选（九）

微信体：2015，记忆 _ 檀传宝

诗五首 _ 张爱明

视窗 >

057 报道 大夏书系读书节：又聚香坊

060 读书会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悦读会”

062 家 我家的书生活 _ 唐春燕

064 文本 童年三人

068 大夏 好学校的样子

072 童年 六月，重新认识儿童

王雪娟：发现自己的使命

11月3日
11月16日



一节课

文 _ 林茶居

同事 C 君转来一份稿件，说是非常棒的一组课堂笔记。我停下手头工作，先读为快。果然如 C 君所言，是组好文章。作者发现问题的敏锐和阐叙问题的节制，让人叹服。文章说到一次听一位老师上口语交际课《祝贺生日》，有一个环节是学生讨论以什么方式向别人祝贺生日。学生发言很热烈，课堂很活跃，陪同听课的校长很满意，但作者发现：每个学生的发言都以“我反对”开始，“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作者的名字叫王文丽，是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的教研员。我相信，王文丽老师一定知道正常的教学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她注意到这声声响起的“我反对”的背后所存在的理念和方法上的问题，她指出：孩子有这样的表现归根结底在于“教师的引导和示范”。

我只是从王文丽老师的文字描述中间接感受这节课的样态，但分明看到了一个法庭式的课堂，在一阵又一阵“我反对”的声音中，孩子们因为脱离了具体的交际情境，仿佛是在作有罪推论或无罪辩护——这是一节主题为“祝贺生日”的本应充满温情的口语交际课，而不是当前一些学校也在尝试的“模拟法庭”综合实践课——当然，在“模拟法庭”的课堂上，也不是只有“我反对”一个理路。

我想起一九五〇年代的时候，香港新亚书院的教授带着学生给作为书院创办人的钱穆先生拜年，希望先生写几句鼓励的话赠送大家，先生写了十六个端正的小楷，其中有八个字是：理直气和，义正词婉。有学生不解：不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吗？先生提醒说：“理既直了，还需要那么气壮吗？义既正了，又何必言词严厉而咄咄逼人呢？”

这八个字在当下可谓广为人知，也频频在各种文章和发言中被引为自我警示或“友情告诫”：有话好好说，得理亦饶人。作为编辑，我对“引

用率”有特别的体会——它实在是观察社会文化现象及变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窗口：人们关注什么，人性中丢失了什么，什么就会被反复提及（引用、诠释……）。

一个推崇“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社会，难免是缺乏尊重、不懂宽容和没有共情能力的，甚至，在某些领域，会激发敌对情绪和斗争哲学。比如我比较熟悉的诗歌界、文学界，其中就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是代际撕裂，前辈很少真诚地推扶后辈，甚至担心被“超越”，后辈对前辈则缺乏应有的敬意，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很聪明地拿前辈作“祭品”；二是圈子互否，不同群体之间彼此无视，有合适的机会就相互攻讦。二〇一二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竟让一些中国作家深受伤害，因为有人“捷足先得”了；而成名于一首模仿之作的余秀华，其实也写出了不少不错的诗作，但在一些诗人聚会的场合还是常常被描绘成小丑。

我不是说莫言足够伟大、余秀华足够优秀，而是想说，有些人深陷于人情和情绪之中，至多也就是一孔之见在起作用，而不是以文学尺度、诗歌尺度、美学尺度作为判断和发言的依据。

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坛有一段佳话：庞德提携了艾略特，艾略特提携了奥登，奥登提携了布罗茨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写出了伟大作品的诗人，而出于对诗神的无条件崇敬而奖掖后辈的举动，更彰显了他们的伟大人格。所谓伟大诗人，端赖于伟大作品和伟大人格的共同造就。

欧美的作家、诗人之间，当然也会发生冲突。比如以《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为我们所熟知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就曾经谴责当时英国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奥登。奥登在一首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名诗歌中“宽恕”了某种“必要的谋杀”，曾经参加过这场内战且差点送命的奥威尔认为这是一种“无道德感”的极权主义，“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谋杀的人”，才会写出“必要的谋杀”这样的句子，这是“不知道火是热的人在玩火”。奥威尔的愤怒源自他心中的真理和正义遭受亵渎，而不是人身受到攻击，或者利益面临损害。有意思的是，尽管奥登并不接受奥威尔的批评，不时自我辩护，但还是修改了这首诗，后来干脆拒绝把它收进自己的诗集。也许，他们在是否应该遵循内心的诚实上最终达成了共识。

由一节课绕到如此宽泛的社会文化场域中来，我很担心自己阐释过度。不过，无意之中我也支起了一面镜子，它照见的是有着类似症候的教育文化和教师文化。对我来说，这也是自己给自己上的一节课。

专栏 >

- 006 汉末学子的光辉岁月 _ 周勇
- 010 教师应当成为知识分子吗 _ 吴康宁
- 012 “名校”的课堂为什么动不了 _ 郑杰
- 015 春风浩荡 _ 吴慧琴

封面 >

- 018 王雪娟：发现自己的使命

人物 >

- 050 **名家** 倪蕊琴 我的托尔斯泰情结 _ 汤涛 俞玮琦
- 微博** 程俊英 / 卡尔·爱德华·萨根

现场 >

- 075 **记事** 曹丽秋专辑
- 一脉脉书香
- 快乐
- 081 **摄影手记** 窗外有一首唐诗（外二篇） _ 高东生
- 088 **课堂** 课堂杂记 _ 王文丽
- 095 **吴非说** 虎妈狼爸们的起跑线
- 097 **朱永新答** 教师要做“领读者”

话题 >

- 099 教师为什么生气(下)
在意本应在意的 _ 赵坡
老师会被气死? 才不呢! _ 武新明 王雷
怎样才能不生气 _ 王方全
做个不生气的教师 _ 汪燕

阅读 >

- 111 阅读与文化 _ 金丝燕

人文 >

- 121 中国教师诗选(九)
微信体: 2015, 记忆 _ 檀传宝
诗五首 _ 张爱明

视窗 >

- 057 报道 大夏书系读书节: 又聚香坊
060 读书会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悦读会”
062 家 我家的书生活 _ 唐春燕
064 文本 童年三人
068 大夏 好学校的样子
072 童年 六月, 重新认识儿童

汉末学子的光辉岁月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紀念时，胡适、蒋梦麟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其主旨是规劝学生“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不要再像去年那样“罢课”发起政治运动。

但胡适又很理解一年前学生为何投身政治运动。他说：“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班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的。”

写到这里，胡适难掩愤怒与痛心，继续说道：“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太学生，宋代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

第二年，胡适又写了一篇《黄梨洲论学生运动》来纪念“五四”。因为当时社会政治愈加变态、腐败，学术教育界又太无声了，胡适不再规劝学生埋头学习，而是表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教育政治学观点：学校是“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他还强调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时已年逾六十，不但一点也不后悔年轻时投身学生运动，反认为它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

才一年，胡适便改变了“对于学生的希望”。看来，“五四”以来的

政局之腐败、学术教育界之死寂的确深深刺痛了胡适。只是他在鼓励学生向黄宗羲学习，以运动来“保国”、“谋政治清明”时，忘了无论黄宗羲时代的学生还是黄宗羲推崇的“汉末三万太学生”，都有成年师辈人物领导、支持他们。

相比之下，“五四”以来的学生则显得孤单、寂寞，即使重新发起“五四运动”，恐怕也只能自己领导自己，不会有英雄师辈人物的领导、支持。直到一九二七年，鲁迅仍在说当时的中国太“无声”了。在那段变态、腐败的历史中，杰出师辈人物如鲁迅，亦只能避居一隅，远远地为学生做榜样，鼓励青年们先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还是看看汉末太学学子及其师辈人物如何携手发起政治纠正运动吧。那时的政治亦是极度腐败，既有梁冀一类为自身利益连皇帝都敢杀的野蛮外戚，还有孙程、曹节、侯览等数十位恶贯满盈的宦官。这些“恶人”动不动就被封为万户侯、二万户侯、三万户侯，汉末全国交税的老百姓不过千万户，能瓜分几次？众多邪恶势力“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其“子弟亲戚”也跟着“放滥骄溢，莫能禁御”。

赵翼曾谓“东汉末，宦官之恶遍天下”。范晔亦言东汉后期“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但在为皇权体制效力的官员队伍中，也有不少诗、书等儒家经学培养起来的正义之士。桓帝永兴元年，即一五三年，华北连遭洪涝、蝗灾，数十万户百姓流离失所。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冀州境内出过三位宦官首领，贪官污吏不计其数，百姓苦不堪言，灾年只得揭竿而起。

朱穆到任后，四十多个贪官污吏弃官逃走，余下罪大胆小者则自杀。不久，一位宦官回乡葬父，僭用皇家排场。“穆闻之，下郡案验。吏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桓帝得知手下宦官“受辱”，大怒，将朱穆贬为左校。消息传到太学，刘陶等数千太学生上书，痛言“当今中官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竭心怀忧，为上深计”。

朱穆嫉恶如仇，刘陶等数千太学生“伏阙上书”为之请命，仅是汉末学生及朝中名士携手对抗腐败势力的序幕，高潮还在后面。高潮期的师辈领袖人物李膺、陈蕃、杜密等，亦皆为朝中名士。尤其李膺，更是大义凛然且文武双全，后世大儒只有王阳明才可望其项背。其在地方任职，每到

一处，贪官污吏亦“多望风弃官”。后“鲜卑数犯塞”，李膺转赴边疆任“乌桓校尉”，鲜卑蛮敌看到李膺蒙上眼睛也能把石头射穿，“甚惮慑”。但如此贤臣良将，还是遭到免官。

之后，李膺在家乡做起了教师，“教授常千人”。品行低劣者如南阳樊陵，也慕名前来拜师，被李膺拒之门外。荀爽也来“追星”，李膺盛情难却，让荀爽驾车载他一回。仅此待遇，荀爽回去后便四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一五六年，鲜卑、羌等蛮敌再犯边境，桓帝只好请李膺出山任“度辽将军”，结果“自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还塞下”。

贪官污吏、野蛮外敌皆怕李膺，三万太学生则写歌传唱，将李膺列为“天下楷模”，只遗憾李膺为国奔走，无法请以为师。但不久机会就来了，一五九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即首都父母官，这下太学生便可请以为师了。李膺也喜欢与后辈俊秀交往，尤其是郭太，更令李膺一见倾心。郭太由此“名震京师”，成为太学生领袖，连回一趟家都会惊动各方，以至“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

太学生与李膺等朝中名士结成了共同体，且一举一动都能引起数千士子的热烈响应，桓帝以来本已腐败至极的政治社会风气随之有了显著转变。如范曄所言：“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四处都有刚直之士，作恶宦官及手下污吏焉能继续瞒天过海，祸国殃民？

杜密在太山任太守，“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案捕之”。范滂下“至州境”，该地守令凡“自知藏污”者，皆“望风解绶印去”。如此等等，皆表明正气在各地升腾，邪恶势力很难再为所欲为。受到遏制的宦官自然会设法除掉李膺及太学生组成的共同体。一六六年，与宦官交往密切的张成打听到明年将大赦，便叫其子杀人。第二年大赦，李膺仍将张成之子“案杀之”。就是此事令宦官抓到把柄，诬告李膺忤逆圣旨，结党作乱。昏庸的桓帝即下诏逮捕李膺、杜密、范滂及太学生两百余“党人”。

名单交到太尉陈蕃这里，签字便可执行抓捕。陈蕃此前就曾为遭宦官打击的李云、杜众等正直之士申辩，此番见到名单上尽是国家栋梁，实在忍无可忍，不仅拒绝签字，还上书质问桓帝：“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

遇善何薄，待恶何优？”桓帝大怒，绕过三公，将李膺等直接交由宦官审理处置。李膺受审时，故意说众多宦官与“党人”有过交往，弄得宦官怕惹火上身，不敢审下去，最后只好“请帝以天时宜赦”，李膺等皆被放归乡里。

第二年，桓帝崩，十二岁的灵帝继位，曹节、侯览等新一批作恶宦官随之崛起。他们先将陈蕃等除掉，接着唆使不懂事的灵帝下诏抓捕李膺等。时为一六九年，本可逃亡的李膺情愿就义，最终惨死于宦官之手，追随的学生也被禁锢。杜密则以自杀保持名节。范滂那边，先是地方县令决心辞职与之一起逃亡，范滂不想祸及他人。其唯一遗憾的是无法尽孝母亲，母亲随之给儿子做了最后一次教导：“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辞”，在场之人“莫不流涕”。

至于太学生领袖郭太，则在首次党锢之祸后便选择“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第二次党锢之祸，他是仅有的两名得免的“知名之士”之一。但李膺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结局显然对郭太产生了影响，第二年他便病死于家中，“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党锢高压之下，仍有如此节义盛况，汉末士子何等刚直不阿！大文豪蔡邕也觉得，生平最骄傲的事乃是为郭太撰写碑文，直叹：“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愧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直到自命为“大贤良师”、创立“黄老道”教的张角登上历史舞台，并于一八四年率领数十万信徒发动起义，党锢之祸才结束。宦官们害怕包括太学生在内的正直之士“轻与张角合谋”，便唆使灵帝赦免“党人”。邪恶宦官终究无法理解李膺及太学生追随者的名士节操，反倒是张角，这位意图推翻刘家皇权的历史人物虽然出身底层，却很了解汉末时局与士气，否则怎会想到以“大贤良师”来招揽信徒？

这些议论有些扯远了，本文真正要说的是汉末太学生有过一段与邪恶势力展开殊死搏斗的光辉岁月。很明显，与“五四”时期投身政治纠正运动的现代学生相比，汉末学子虽然最终也未能成为历史变革的主导力量，但他们发起政治纠正运动期间，却不像“五四”学子那般孤独，只是自己领导自己，因为有李膺、陈蕃、杜密等嫉恶如仇的师辈“天下名士”领导、支持他们。

教师应当成为知识分子吗

文_吴康宁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督学。著有《教育社会学》、《转向教育的背后——吴康宁教育讲演录》、《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等，主编有“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丛书”等。

美国著名批判教育学者亨利·A·吉鲁为其《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一书的中文版（2008年）写过一篇序言，题为“中国教师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吗？”，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对于教师是否应成为知识分子的问题，国内学人也有不少讨论。作为讨论议题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当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有知识的人，而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南方人物周刊》二〇〇四年评选公共知识分子时曾提出三条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对于教师来说，这三条标准中最难做到的是第三条。原因就在于它直逼一个要害问题：教师是否也应充满批判精神，尤其是是否也应批判现实社会？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就笔者所知，几乎在所有国家，被视为或自视为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的人，都是要代表所谓“社会的良心”的。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奉旨行事不是他们的任务，歌功颂德不是他们的本行，批判才是他们的使命，牛氓才是他们的楷模。

不用说，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是有的，如俄国的赫尔岑、索尔仁尼琴，法国的左耳、萨特，我国的鲁迅、邹韬奋以及顾准……这样的知

识分子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因为一个只是陶醉于歌舞升平的社会不可能走得很远。

然而，教师应当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吗？对于这个问题，好像很难予以肯定回答，因为只要尊重逻辑，只要稍微理性一点，就不能不先回答以下几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教师难道能把批判现实社会并诱导学生也去批判现实社会作为自己的唯一要务吗？学生难道不需要客观把握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全部事实、全部奥秘、全部可能吗？教师如果真的像知识分子那样，只是批判、批判、再批判，又如何能指导学生全面考察、全面分析、全面评价、全面展望呢？

看来，教师要全面完成培养学生的任务，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尽管教师是有知识的人，且有些教师还是极有知识的人。

另外，值得留意的还有以下三个事实：

其一，迄今为止主张教师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基本上都供职于高等学府，而很少有中小学教师。这是因为中小学教师并不认为自己应当成为知识分子呢，还是因为他们并不觉得教师是否应成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二，《南方人物周刊》二〇〇四年评选出的五十六名“公共知识分子”（含已辞世者六人）中虽然有40%为大学教师，但他们并不是以教师身份及教书育人业绩被认可的，而是作为经济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社会学家、作家、艺术家、公众人物及专栏作家等九种角色类型的代表被选入的。

其三，就笔者所知，在慷慨激昂地主张教师应成为知识分子的诸多人物中，在义正辞严地批判现实社会并因此而以知识分子自居的诸多人物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从现存体制获取的既得利益并希望获取更多利益的人也绝非凤毛麟角，倒是比例反而较高。

不过，话说回来，教师虽然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知识分子，但教师是否就只能认同现实、接受现实、尊奉现实，并引导学生也同样如此呢？本文已没有篇幅继续琢磨，那就留给下一篇小文吧！

“名校”的课堂为什么动不了

文_郑杰

郑杰 生于一九六八年，曾任上海市北郊学校校长。现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培训、咨询等工作。出版《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顾此失彼》、《边走边叹》、《没有办不好的学校——郑杰教育讲演录》、《忠告中层》、《首席教师》等专著。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自二〇〇一年颁发至今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课改”成为了教育界的主流话语。在教育界的话语系统中，名校们常常能执“新口号”牛耳。这些学校在当地的优势地位，使它们天然地就比其他学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见报率”和“上镜率”也就更高，似乎名校都在搞课改，而且成效显著。

名校是很容易证明其课改成效的，他们只要出示学生的获奖证明，有多少是国际级的，多少是国家级的，多少是省级的，这么清点一下，就很有说服力。而且往往还能加上一句：升学率不降反升。可是真要推敲起来，那份获奖清单上的奖项，军功章应该分给谁？我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逻辑错误就是将“因果”弄反，比如说我们认为游泳的人身材好，其实是身材好的人被选去练游泳；我们认为名校能培养优秀学生，实质是优秀学生进了名校，优秀学生成就了名校。

优秀学生是可以拿来为学校任何行动取得成效的证明的，比如说，要总结德育先进经验，可以骄傲地宣布抓了德育工作后学生有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上面要检查教学常规，也可以将学生多么出色作为效果的体现。在“以结果论英雄”的社会背景下，那些一般学校和薄弱学校即使某项工